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

北京郊区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调查

北 京 出 版 社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

七十年來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回憶

沈 雁 冰 著

想 想 过 去， 看 看 現 在

——北京郊区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典型調查

北 京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

想想过去，看看现在

北京出版社編輯、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 3 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95 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 · 印張：12/16 · 字數：12,000

1958 年 8 月第 1 版 195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9,000 册

統一書号：3071·57 定价：（5）0.08 元

前 言

1957年8月到12月，北京郊区农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次运动中，各乡农民为了同少数有严重资本主义思想的富裕中农说理，驳斥他们所谓“合作社没有优越性，不如单干好”、“合作化后农民生活降低了”等等错误言论，摆出了很多生动的事实，来说明解放前后特别是合作化前后农业生产 and 农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很多乡、社干部也作了典型调查，来说明农村在解放后特别是合作化后的伟大进步。这些调查材料非常生动有力，对我们了解农村很有好处。现在选择了三个农业社的调查材料，彙编出版，供读者参考。因为时间关系，这些调查材料没有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后，生产高潮带来的变化写进去。

1958年3月

目 录

前言

合作化前后大变样的田村·····	1
中山村改变了历史面貌·····	9
看丹乡的过去和现在·····	16

合作化前后大变样的田村

海淀区田村乡，位于北京西郊，距城十八里，是1954年由田村、龔村、廖公庄、什方院、山南等五个自然村合并組成的。全乡現有九百六十三戶，共四千零四十人，其中从事农業的六百零五戶，共二千八百八十一人。

解放前，全乡共有土地五千五百零八亩。其中田村的土地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黃土地，比較肥沃，廖公庄、龔村的土地大部分是薄沙地，产量很低。

解放前土地占有情况是这样的：地主四十戶，有土地二千零二十二亩，占全乡土地总数的36.7%，富农二十八戶，有土地六百七十九点五亩，占12.4%，中农一百二十七戶，有土地一千七百六十三亩，占32%，貧雇农二百八十四戶，有土地一千零四十三点五亩，占18.9%。絕大部分貧雇农生活無着落，他們或者給地主扛活或者出外“乱抓”：做小买卖，当木匠、瓦匠，給別人糊棚、赶車、拉駱駝，所以完全靠农業的戶很少。地主剝削手段非常狠毒，大部分雇农扛一年長活，地主只給玉米二石左右，还要千方百計地剋扣工錢，有的甚至还要扣鹽錢和菜錢，到了年終一算，雇农还欠地主的賬。貧农王增杰給地主扛長活，五年就落下一个破

棉襖，一家子沒有被褥，就靠这个棉襖过冬，沒有房子，一直住在小庙里。扛長活顧不了家，老的小的只好在外要飯。給地主干活，下雨天也不能歇工，不是推磨就是垫猪圈、起牲口棚。

解放后，土地改革时，分了地主二千八百三十亩地，一百五十五間房，农民生活逐步安定下来。1951年开始搞互助組；1953年成立了一个十八戶的初級社；1954年与廖公庄、龔村合并，發展到一百二十八戶社員；1955年有五百四十八戶社員；1956年全乡六百零五戶，除兩戶未入社，其余六百零三戶全入了高級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数的99.6%，完成了农业合作化的历史任务。

合作化以后，田村乡农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發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生产条件上的巨大变化。全乡現有土地五千五百一十八亩。1948年全乡只有水地五百六十六点五亩；合作化以前的1954年安了兩眼电井，水地發展到九百八十六点五亩；1956年开了一条長二千四百公尺的大水渠，又新安了五台鍋駝机，水地發展到二千八百多亩。在新式农具利用上，除小社原有的十八部新式步犁外，1956年又增添了七部双輪双铧犁，而且迅速地發展了机耕地。1954年該乡只有三百亩地使用机耕，現在已有三千亩地使用机耕。还有一千四百亩地使用了机播。从1955年起，这个乡就用机器打麦了。

合作化以后，大力發展了蔬菜生产。这个乡1948年仅有菜地五十六亩，1954年發展到二百四十七亩，現在已發展到

一千五百二十亩，并且注意了細菜的生产。1954年發展了六百塊陽畦和一百二十八間溫室，現在已有陽畦一千零二十塊，溫室一百五十四間。原規劃到1962年發展果樹三百四十亩，現在已經提前完成了。基本建設也有很大的增長，1954年共有豬圈、牲口棚、水井、辦公室等基建房屋三十六間，現在有三千一百二十六間。社內公積金1954年只留一千二百一十二元，1955年留了八千五百四十三元，1956年留了一萬五千六百一十八元，今年計劃可留三萬元。

由于生产技术和生产条件上的变化，粮食單位面积产量有了显著的提高。1948年全乡粮田每亩产量約一百五十斤；1954年是涝灾，每亩平均产量一百四十斤（根据当时調查，單干戶八十斤左右）；1955年每亩平均产量一百八十九点二斤；1956年虽是雨水最多的一年，同时風灾、虫灾也較大，但是，产量仍超过了1955年，达到了二百三十五斤；今年施肥質量高，庄稼样样長得好，粮食的平均产量可以超过三百五十斤，約等于1948年的兩倍半，比平常年景的1955年提高85%，比1956年提高49%。

社員收入是連年提高的。1954年每戶平均收入三百零七元，1955年每戶平均收入四百二十二元，1956年每戶平均收入六百一十六元，今年預計可以达到六百九十七元。按1956年年終決算时純收入，加上社員自己养猪和自留地等副業收入，以每人每年平均收入計算，六十元以下的有二十戶，六十元至一百元的九十五戶，一百元至一百五十元的一百六十七戶，一百五十元至二百元的一百零九戶，二百元至二百五

十元的六十六戶，二百五十元以上的一百四十六戶。以當地農民公認的有代表性的富裕中農張鳳池入社前的生活水平為根據，田村鄉有81%的社員戶達到和超過了當地富裕中農的生活水平。張鳳池解放前八口人，種二十五畝上等地，自己有牲口，有水車，糞大，地肥，產量高。1948年收入情況是：水地小麥共產七百斤，折合八十四元，旱地小麥共產一千七百斤，折合二百零四元，玉米共產一千五百斤，折合一百二十元，谷子共產三百斤，折合二十四元，高粱共產一百三十五斤，折合八元一角，花生共產九百六十斤，折合一百六十元，副業收入（當瓦匠、做買賣）一百二十元，共計收入七百二十點一元。開支情況是：完糧玉米六百五十斤，折合四十八元，小麥二百五十斤，折合三十元，雇工折合四十八元，玉米種子六十斤，折合四點八元，小麥種子三百斤，折合三十六元，谷子種子十斤，折合八角。共開支一百六十七點六元。全家一年純收入合五百五十二點五元，平均每人每年生活費用六十九元。

入社前1953年的收入情況是：小麥共產一千一百四十斤，折合一百三十八點八元，玉米共產一千一百四十斤，折合九十一點二元，花生共產一千三百二十斤，折合二百一十一點二元，綠豆共產一百二十斤，折合十四點四元，蔬菜收入折合七百元，養豬一口除糞錢折合四十元，副業（挖沙子）收入七十元。共計收入一千二百六十五點六元。開支情況是：花生種子二十斤，折合四元，小麥種子一百五十斤，折合十八元，玉米種子二十斤，折合一點六元，雜糧種子十斤，折合一元，化學肥

料兩千斤，折合六十元，菜蔬种子十元，雇工九十個，每工一點五元，折合一百三十五元，公糧麦子二百五十斤、玉米七百五十斤，折合九十元。開支共計三百一十九點六元。全家一年純收入九百四十六元，九口人，每人平均收入一百零五元。

田村鄉農民由於收入逐年增加，在物質生活上到處顯示出一片新的氣象。先說住房，合作化前，每次下大雨，鄉、社、派出所幹部都要總動員進行查房，恐怕砸壞了人。1954年鄉長辛存義家的房落了架，四口人差點給砸死。現在全鄉原有的二千一百七十七點五間房，已有一百零六點五間進行了翻蓋，其中60%是合作化後翻蓋的。新蓋房達三百五十八間，其中73.3%是合作化以後蓋的。現在全鄉有危險的房已經絕迹了。穿衣情況也有了根本的變化。解放前這個鄉的農民很少自己買布做衣服穿，大部分到北京小市上尋破爛，穿得補了再補。如貧農韓春林，解放前全家四口人，沒有買布做過衣服，每逢換季換不下來，就東摘西借上小市對付兩件破爛；全家沒有被褥，就靠一條舊軍毯過冬。現在他家五口人，都有了冬夏季的衣服，還新做了三條被子、兩條褥子。根據幾戶的調查，用布變化情況如下：三戶貧農共十二人，解放前平均用布九十八尺，每人平均八點一六尺；解放後十五人，平均每年用布二百八十二尺，每人平均十八點八尺。三戶下中農共十八人，解放前平均每年用布一百八十三尺，每人平均十點一七尺；解放後二十三人，平均每年用布三百七十點五尺，每人平均十六點一尺。各階層農民用布量都有很大提

高，尤其是貧农，因原来家底薄，提高得更为显著。这个乡1954年共有絨衣一百五十八件，現在增長到六百零六件。解放前全乡有自行車六十四輛，80%以上是地主、富农和商人的，1954年有自行車九十四輛，現在已經达到一百八十輛，50%是入社后購買的。1956年年終分紅后，仅田村一村，一次就买了十六輛新的飞鴿牌自行車。現在有許多人下地干活都騎着自行車去。吃的大部分是細粮。1956年10月至1957年9月全年口粮共計一百一十二万零八百二十七斤，平均每人三百八十九斤，其中麦子和面粉五十三万七千三百二十八斤，大米二十七万五千八百二十七斤，大米和白面占了72.5%。1956年社內安了电磨，社員都不为磨粮食着急了。社員刘文佩說：“入社前自己种地有数不清的急，沒有粮食着急，找不到牲口着急，庄稼弄不回来着急。剛入社只有一个急，就是沒功夫推磨，現在一个急也沒有了。”合作化后，农民的購買力大大提高了，例如，解放前只有富裕戶使暖壺，合作化前的1954年，也只有暖壺九十多个，現在差不多家家都有了；很多社員都帶暖壺下地。解放前全乡只有手电筒十八个，1954年也不过一百个，現在已經有了二百八十多个。

文化教育方面也有很大的發展。解放以后在文化班畢業的有二百二十三人，正在文化班學習的有四百五十人，有五十人上了高小班，三十多人上了初中班，青年人基本上摘掉了文盲帽子。合作化后，修建了圖書室和俱乐部，每晚都有三五十人到俱乐部下棋、打扑克、看書。有許多青年自己买了胡琴練曲子，每逢年节，总要排練很多节目在本乡表演或

参加会演。1956年建立了广播室，目前已安装小喇叭三百三十七个，五十瓦的大喇叭两个，家家户户都能听到有线广播。社员普遍反映说：“过去听不起戏，解放初要听也得跑几十里路，现在坐在炕头上什么戏都听得，哪里的事情都能知道。”此外，并有许多户买了收音机，解放前全乡只有地主、富农、商人有收音机十六架，1954年有二十六架，现在全乡共有收音机五十一架。

现在学龄儿童都上了学，不仅初中学生增加十几倍，并且有一人上了大学。从入学情况来看是这样的：

解放前：

学 生 \ 成 分 人 数	貧 农	中 农	富 农	地 主	共 計
小 学 生	43	42	15	28	128
初 中 生	1	4	4	2	11
共 計	44	46	19	30	139

解放后

学 生 \ 成 分 人 数	貧 农	中 农	富 农	地 主	共 計
小 学 生	145	89	31	41	306
初 中 生	44	43	12	26	125
高 中 生	5	8	1	3	17
大 学 生		1			1
共 計	194	141	44	70	449

除了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文化生活丰富之外，衛生情况也大大变了样。过去乱倒髒土，小孩到处拉屎，現在街道修了柏油路，按生产組織建立了衛生制度，家家户户、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很干淨。合作化以后，新打了兩眼飲水井，并坚持了每天撒消毒粉的制度。全乡有三个受过專門訓練的接生員，衛生站也有專人对孕婦进行产前檢查；生孩子乱找人接生的現象已經沒有了。1956年建立了中西医联合診所，再也沒有人乱找大夫了。虱子、跳蚤也几乎絕迹了。社內建立了大糞坑和專門的大糞場，大糞不到处堆了。許多社員家里都做了雞圈，不讓小雞到处跑，猪圈也勤墊勤起。

(1957年10月26日)

中山村改变了历史面貌

大安山乡中山村，座落在周口店区海拔六百公尺的半山上，四面群山环抱，山谷深长而窄，风多而猛，雨量缺乏，降雨期晚，无霜期约一百八十余天。该村现有一百五十二户，六百九十二人，土地七百九十二点四亩。所有的耕地都是山坡梯田，地塊零碎，地形不规则，不大适宜耕种。全村最大的一塊地，面积不过兩亩，其余都是几塊一亩甚至几十塊一亩的。在全部耕地中，以灰石、砂礫土質为多，降雨不久，水分都滲入下層，因此常患干旱之灾。群众称这等地为“使死龙王爷”的地，它的产量很低，一般年成每亩只能产百斤左右。在这群山之中，蘊藏着多种矿产，已经发现的，就有銅、鉄、金、水晶石等；燃煤方便，群众燒煤多是自掘自采。由于山多谷长，内外交通非常不方便，羊腸小路布满群山，車馬难行；附近可行車馬的路只有一条，但是每逢雨季，这条唯一的大道也要被山洪淹沒，到秋末冬初方能恢复行走。

在旧社会，住在这里的勤劳的农民过着悲惨的生活。除了三戶地主、富农以外，都是一些祖祖輩輩过着穷困生活的人，他們一年四季都在劳动：冬走窖，秋燒炭，夏打草，春耕田；可是他們的生活仍然处在飢寒交迫之中。农民說：“我

家穷得上無石板，下無瓜按（种瓜的地），甚至連个落雀的梢子也沒有。”他們春天吃的是苦麻菜、榆叶、椴叶、桑叶、柳叶以及木蘭牙、臭椿头等；夏天吃的是猪毛尾菜、落利菜、人青菜、馬肉苗；秋天吃的是杏叶、桃叶、槐叶、花椒叶；冬天吃的是瓜瓢、谷糠等。为了使枯黄落叶的冬天也能吃到野菜，夏天还要多多地采集、晒干、儲存，群众說这是“六月的草，臘月的飽”。当儲存的树叶快要吃光的时候，农民們就說：“熬着吧！榆大人（即榆树叶）快放賑来了。”野菜和树叶畢竟不是粮食，它只能使人不致餓死，与人体的需要相差还很远。由于吃野菜和树叶过多，年輕的姑娘和年輕的小伙子都長得青面綠膚，失去了青春的丰潤的光澤；老年人更是骨瘦如柴；壯年人的劳动能力大大下降；尤其是小孩子一見吃树叶就哭，媽媽們常常伴着泪水来喂孩子。至于衣着等物更是無法談到。男人們穿着五年衣、十年衣，甚至一輩子衣、三輩子衣，許多女人只有褲子沒有上衣，年輕的姑娘因为沒有衣服，怕見外人。夏天还好，一到严冬就算大难临头，天冷不敢出門，只好躲在屋子里燒炕取暖；天气越冷火燒得越大，靠它来度过严冬。农民說：“冷了就是烙烙这面再烙烙那面。”夜間沒有被子，只得一家几口挤得紧紧的，互相偎着取暖。当提到被子的时候，农民都說：“我們是鋪着脊梁骨，盖着肚荐皮。”

1943年是当地农民生活最困难的一年。那时，正是日本鬼子在大安山（距中山七里）建立据点的第三年，日本鬼子瘋狂地抓伏斂款，構築工事，修建碉堡，每天向中山村要民

伙三五十人，捐稅無其數。再加上天旱不雨，沒有收成，麻疹、虐疾等傳染病流行，全村农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年，該村五十三戶貧农因飢餓而死的就有三十人，八十三戶中农也餓死了三人，全乡有四十三人逃荒，有兩人餓死在逃荒的路上。餓死的人占貧农和中农这两个階層总人数的5.4%。貧农赵成花全家六口，这一年就餓死了三口。她的父母先把她賣給別人作童养媳，身价六十元，只值二斗半粮食，后又把她的大姐赵大穩賣出，身价三十元，最后她的父、母、弟、妹四人逃荒到黃安坨；不几天她的母亲就餓死了，后来，她的父亲、弟弟也相繼餓死。

中山村的农民在那样極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始終坚持着对敌斗争，該村于1939年建立了中共支部，从那时起，党就組織本村农民割电綫、埋地雷，用各种方法打击敌人。全村农民積極地为八路軍送公粮，做軍鞋。全村有三十多人参加軍队或参加革命工作。1944年我軍攻克了大安山，中山村于1944年、1945年、1946年三次調整了土地。1947年这里又进行了土地改革，五十三戶無地或少地的貧农和下中农先后分到了二百九十八亩土地，三十五間石板房。

1946年，这里开始組織互工組，在長期的生产活动中，显示了組織起来的优越性。1953年冬季，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綫的鼓舞下，当地有七戶农民組成了一个初級农業生产合作社。1954年，农業社扩大了很多，还建立了一个新社，这时共有社員一百一十八戶。1955年冬，在學習了毛主席的“关于农業合作化問題”以后，兩社合并为中山农林牧生产合作